

怀念我的母亲冯莉娟

郑心校

2023年3月27日，母亲冯莉娟的告别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兰厅举行。在告别会上，我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全国政协，为辞世的母亲举办如此高规格的告别会。衷心感谢参加告别会的各位领导和亲朋好友，衷心感谢为母亲送别会赠送花圈和挽联的团体和个人！

在母亲的送别会上，我们选择了一首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民歌《茉莉花》，因为这首歌是妈妈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



郑庭笈、冯莉娟夫妇

抗日战场上“千里寻夫”

我的母亲冯莉娟1924年农历2月26日出生在湖北省衡阳县西渡镇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其父是忠厚淳朴的农民，也兼管理家族的祠堂。她的大伯知书达理，开设了一所私塾。我的母亲性格开朗，喜爱学习，从小就在大伯的私塾里读书。大伯的女儿和母亲非常要好，后嫁到县城里，每次回乡探亲回来的时候，经常和母亲谈起“外面的世界”。母亲受到她的影响，也希望一定要走出山村。

1940年初，在昆仑关战斗中荣获杰出战功的父亲郑庭笈随部队到衡阳附近进行休整。经大伯女儿的介绍，父亲和母亲相见，双方都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样，他们很快相爱、结婚了。

婚后不久，郑庭笈所在的部队被整编到第五军第二〇〇师，作为先头保卫战中，郑庭笈作为第二〇〇师步兵指挥官兼该师五九八团团负责同古保卫战的前线指挥，率部击溃了数倍于我的日军的猛烈攻击，坚守阵地12天。收到撤军命令后，在郑庭笈的精心布置下，部队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于深夜悄然渡河，全员（包括所有伤病员）均得以安全撤退。

在突围返回祖国的途中，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身负重伤，临终前将部队交由郑庭笈指挥，并叮嘱他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郑庭笈不负师长重托，率领部队进入了野人山，经过千

辛万苦，才将师长的遗骨和部队带回国内。此时，滞留昆明的母亲对战场的一无所知，一天突然接到政府送来父亲的阵亡通知书及抚恤金。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郑庭笈已经殉国，母亲冯莉娟却拒绝接受阵亡通知书及抚恤金，她说：“我觉得他就是没死！就算死了，我也得见到他的部队，见到他的尸首！”随后便义无反顾地开启了艰苦的寻夫之旅。一路上，她忍饥挨饿、风餐露宿，多方打听无果，就在绝望之际，竟然在云南玉溪街头与丈夫的指挥车不期而遇。他们夫妻二人得以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重逢。

那一年，母亲冯莉娟才只有18岁。经历此次“生离死别”，他们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毅然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的一员

郑庭笈随远征军回国后，由于赫赫战功，很快晋升为师长，同时兼任昆明机场的警备司令。抗战时期，昆明是盟国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的一个重要交接点。郑庭笈在任职期间与冯莉娟一起，接触到了国民党战区司令级别高级军官，同时也与当时援助中国的外国军官和部队进行了接触。由于郑庭笈不在抗日的第一线，这段时间他们夫妇生活比较安定，相继生下3个女儿，又于在1947年农历2月19日生下了我。

解放战争中，父亲郑庭笈先后被任命为新编第六军副军长以及四十九军军长，加入了廖耀湘的第九兵团。1948年10月，廖耀湘的第九兵团被东北解放军全歼，兵团司令长官廖耀湘被俘，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也随同廖耀湘一起

被俘。由于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有一定的了解，在解放军规劝、教育下，郑庭笈发表了电台广播投降书，他的投降行动在国民党军高层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9年4月，郑庭笈还特别写信劝冯莉娟不要去台湾，留在海南等待相聚。管理人员担心冯莉娟收不到信，又特意安排郑庭笈通过广播向冯莉娟喊话说他目前安全，同时告诉冯莉娟和孩子：“你们不要去台湾，解放军优待我们，我不久就要回到你们身边，与你们团聚。”

幸运的是，冯莉娟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又在广播里听到父亲的声音，禁不住喜极而泣。冯莉娟毅然作出决断：选择了留在大陆，带着家人留在海南文昌老家等候父亲，并退回了国民党当局送来的船票。

1950年，海南解放，母亲可以给郑庭笈写信了。她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家里住着解放军的通讯排，他们纪律很好，对孩子们都很好。”

周总理亲自促成我父母再续前缘

新中国成立后，妈妈带着我们5个孩子在海南文昌度日。1953年夏天，母亲带着我从海南岛前往抚顺东北看望父亲。见到我们后，父亲的心情激动得难以形容。

1956年5月，父亲郑庭笈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继续接受改造。为了探望父亲方便，母亲冯莉娟千里迢迢带着5个子女搬到北京。那一年，她还不到30岁。刚开始，一家人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生活困难。所幸，她得到了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郑洞国和黄期的帮助，

她也通过自身努力，学会了中文铅字打字以及制作绢人等多种技艺，做到了自食其力和养家糊口，得到了组织和街坊邻里交口称赞。为避免“战犯家属身份”影响到子女的前程，父亲和母亲于1957年离婚。

由于父亲改造积极，1959年成为第一批被特赦人员的一员。1959年，当周总理接见父亲郑庭笈时，得知母亲冯莉娟已经与父亲离婚，但仍与婆婆住在一起，并未成立新家时，就鼓励父亲争取复婚，并让相关同志做“撮合”工作。

1960年当周总理再次接见郑庭笈，并得知仍未复婚时，就叮嘱全国政协帮助进一步做工作。政协有关同志得知母亲有中文铅字打字技术，就聘请她为政协打字员，在家中配置一台打字机，负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打字工作。此时，为了保证被特赦后的父亲的生活来源，组织上安排他成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得以经常和母亲接触。

周总理的亲自关心，全国政协相关领导和同志们的精心安排以及父亲的诚意感动了母亲，一段时间相处后，1962年，他们决定复婚。他们再次举行了婚礼，并包了一顿素饺子，招待了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就这样，经历了聚散离合的我们一家，又重新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

周总理再次接见时，看到他们同时出现，高兴地对他们表示祝贺。后来，母亲一再教导我们：周总理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不辜负他的期望。

夫唱妇随，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此后，父亲全身心投入到文史专员的工作中，晚年还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与民革中央监察委员，致力于促进两岸统一大业。母亲冯莉娟则“夫唱妇随”，多次陪同丈夫前往香港、台湾寻亲访友、拜会故交，探望父亲曾经的长官、同僚以及下属或是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积极交流，向他们讲述自身的经历，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父亲去世后，母亲继续父亲的工作，直到母亲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仍然关注两岸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

母亲非常喜欢听《茉莉花》这首歌，每当《茉莉花》的音乐常在我家响起，尤其是歌中唱到“让我来将你摘下，送给别人家”的时候，她总是精神亢奋，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

作为她的孩子，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幸运。妈妈，我们永远爱您！
(作者为郑庭笈、冯莉娟之子)

抗战中的郑庭笈

贾晓明



行进中的中国远征军

12月24日，在八塘、九塘之间担负阻击任务的郑庭笈部队建立了功勋。他用望远镜观察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少将旅长中村正雄也被炮火击中，于24日身亡。

紧接着，郑庭笈又率部参加了夺取界首之战。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敌人最坚固的据点。当时，戴安澜所率的二〇〇师担任攻坚任务。

由于和敌人多次血战，二〇〇师损失惨重，杜聿明急调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给戴安澜的二〇〇师指挥。郑庭笈率第三团赶到战场，于28日晚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性命顽强进攻，该团九个步兵连，七个连长伤亡，战士伤亡过半，在郑庭笈身边的司令长官李均也中弹牺牲。郑庭笈临危不乱，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他组织士兵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入夜后再次发起猛攻。对于敌人的火力点，郑庭笈组织突击队，将手榴弹塞进敌据点枪眼，逐个清除，终于于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

“东联”的成立和发展

黄宗慈



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流亡关内的广大东北民众接受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北平的东北各大专学校在“一二·九”运动中纷纷成立学生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春，由李延禄、于毅夫、赵濯华、张克威、陈大凡等组织了“东北人民抗日会”，出版了《东北之光》等刊物，宣传抗日。继之，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妇女救国联合会、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黑龙江救国联合会、吉林救国联合会、图存学会等纷纷出现，出版刊物有《东北生活》《东北呼声》《黑流》等。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东北各阶层人民抗日力量，1936年秋，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会等13个团体又合组为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东联”），出版机关刊物《东北知识》。“东联”的会址设在西直门内东北大学校部，领导人为于毅夫、李延禄、张克威、赵濯华、陈大凡、汪之的、张希尧、李向之等。

“东联”成立后，在关内东北人民中展开抗日救亡活动，曾发动会员前往西安和保定等地，进入东北

军学兵队、东北军五十三军吕正操团等部开展工作。1936年11月，绥远抗战打响，“东联”派于毅夫等去绥远傅作义部进行慰问。西安事变爆发时，“东联”在北平散发张、杨八项主张的传单，组织各界进行宣传，支持张杨，并派代表去西安取得联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联”曾发动签名运动，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由于毅夫等将载有东北人民大量签名的请愿书提交给国民党三中全会。

1937年春季，国民党企图强行接收暂驻北平的东北大学，遭到爱国师生的强烈抵制。“东联”立即组织声援，表达对东北大学师生的支持。5月，东北大学同学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东联”发动旅平东北民众准备随同学生南下，为学生提供支持，后因“东大”同学乘坐的火车被国民党军队扣押于江苏柳泉车站，遂停止前往。1937年7月，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东北大学数百名同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抗战全面爆发后，“东联”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宛平、长辛店等地，进行慰问、宣传活动。北平失守后，“东联”骨干一部分南下，继续开展救亡活动，一部分前往陕甘宁边区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还有部分骨干在董学礼、戴福纯、高鹏等的带领下，直接拿起武器，和日伪进行战斗。

程潜领导湖南“讨袁驱汤”行动

杲学军



1915年，袁世凯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后，程潜赴云南加入护国运动，参与谋划云南起义，于1916年2月1日被蔡锷、唐继尧任命为护国军湖南招抚使，任务是配合护国军开展讨袁战争。3日，程潜带领一营部队启程，经贵州返回湖南。

程潜计划先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一面召集旧部、改编地方守备部队和编练地方团队，一面组织和动员民众，反抗袁世凯的北洋军。程潜于3月25日抵达靖县，设立护国招抚使司令部。他收编了矿警和一部民军，加紧训练，同时又着力整顿民政，革除积弊，废止袁世凯所颁布的法令。

程潜在湘西的招抚工作进展迅速，不少县纷纷派人前来联系，各县的守备部队也都愿意接受护国军的改编。至4月10日，整个湘西除常德、桃源、沅陵、辰溪、古丈、麻阳6县，因驻有北洋重兵未能响应外，其余20余县都已宣布独立，参加讨袁护国。盘踞湘西的北洋军处于民军包围中，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随着全国护国运动形势的发展，湘西的反袁民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为巩固和发展这一形势，程潜等决定于4月26日在靖县召开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通知全省每个县推举一名代表出席会议，并在会上推举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然后宣布湖南独立。会议如期举行，有48个县派代表出席，超过全省县总数

的一半。会议一致推举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决定自即日起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及其所任官吏，“一律视为逆党，概不承认，要为维护共和，殒除国贼而奋斗”。

4月28日，程潜正式就任总司令职，宣布湖南独立，誓师讨袁。此时，除各县民团外，程潜已编组了两个旅的湖南护国军，声威大震，逐渐向湖南南部和中部发展。在广西护国军的支援下，程潜率部沿邵潭大道急速向长沙挺进。5月18日，袁世凯的“一等侯”、湖南将军汤芑铭派去镇守衡州的部队为图自保撤退，因而使长沙门户洞开。这期间，湖南各地的革命军人和工农群众也响应程潜等的号召，纷纷起义，到5月下旬，程潜领导的湖南护国军发展到3个旅，加上各地武装力量，长沙实际上已为民军所包围；与此同时，陆荣廷率领的广西护国军也进至衡阳一带。汤芑铭不得已于5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暗地里却继续部署部队和程潜作战，还派出杀手刺杀程潜，被程潜的部下捕获。

6月，袁世凯暴死。程潜对部下说：“救国讨袁，匹夫有责。汤芑铭为虎作倀，罪恶滔天。现在袁氏虎不存，汤贼又将何有？”

7月1日，程潜率护国军第二旅进逼长沙。汤芑铭派兵迎战，企图阻止护国军前进。经过一番激战，汤军官兵阵前倒戈，归顺护国军。汤芑铭得此消息，慌忙于4日逃离长沙。6日，程潜率护国军进入长沙。

“单艇独雷”战巨舰

吴小龙



1955年1月10日22时39分，东南沿海白岩山观通站雷达兵报告：发现敌舰！东海舰队鱼雷艇第一大队指挥员刚刚部署舰艇迎敌，就得到102号鱼雷艇艇长张逸民的请战要求。原来，就在当天稍早，102艇与101艇编队出海迎击敌舰。当敌舰就在眼前时，102艇的左发射管却由于技术故障，鱼雷未能击中目标。就这样，张逸民和全体艇员“窝着一肚子火”执行了返航的指令。

经领导研究，同意了张逸民的请战要求。虽然在返航后，102艇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立即检修了发射管，但再次出航时只有一个发射管里装有鱼雷，而一条1吨重的鱼雷对于排水量仅有22吨的鱼雷艇平衡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天气恶劣的海面上急驶，其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出发时，张逸民命令艇员尽量靠在一侧，用人的体重勉强“配平”。经过劈波斩浪，23时18分，102号艇和敌舰在海上“不期而遇”了。敌舰是排水量1030吨的“洞庭”号炮舰。该舰速度比较快，能开到24节，机动能力较强；炮火威力大，舰首为76.2毫米火炮，舰尾有40毫米火炮；吃水很浅，只

有两米多一点，号称“不怕鱼雷攻击”。张逸民立即命令“全体人员进入战位，准备发射鱼雷”。张逸民明白眼前的局势，“孤艇独雷”战巨舰，必须确保一发命中要害，只有这样才能免遭敌人的毁灭性反击。“近些，再近些！”张逸民命令轮机长以35节的高速向“洞庭”号扑去。

500米，400米，300米，250米……由于海上风大浪高，隐蔽得当，敌人根本没有发现102号艇的快速接近。在距离敌舰只有200米的距离时，张逸民下令发射了鱼雷。发射后，102艇全速“倒车”，由于惯性，仍然向前冲了几十米，然后才一个180度大转弯，急速掉头，以最高速度远离敌舰。

约10秒后，敌舰被击中，一声闷雷般的巨响后，海面上升起了一个约20米高的水柱。由于距离太近，102号艇上的所有玻璃和安全灯罩全部被冲击波震碎，舱面6人瞬时失明。张逸民命令102号艇停止行驶进行观察，在确认敌舰中弹后，立即向上级汇报。随后，张逸民率102号艇胜利返航，受到战友们的热烈欢迎。

102号艇击沉敌舰“洞庭”号，开创了海军快艇作战史上的奇迹。此前在世界海战史上，还没有单艇独雷在大风浪中击沉敌舰的先例，更没有在200米内发射鱼雷的先例。战后，102号艇被授予“功勋鱼雷快艇”，张逸民荣记二等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时任十四军十师五十九团二营少校营长的郑庭笈，率部参加忻口会战。虽然面对的是武器装备优良且有空军配合的日军，但郑庭笈勇猛作战，带着战士们浴血拼杀，取得了灵山争夺战、大白水防御战等多场战斗的胜利。战斗中，郑庭笈在观察敌情时突遭日机轰炸而身负重伤，幸亏抢救及时，才保住性命，也因为这次遇险，从此郑庭笈给自己取号“重生”以纪念。

养好伤后，郑庭笈升任新编陆军荣誉第一师四团团长，参加武汉会战。当时的郑庭笈部，负责长江南岸阳新的守卫。阳新位于武汉外围，是长江南岸重镇，日军进攻武汉的必经之路。战斗打响后，日军集中力量对郑庭笈部防守的阵地发起猛攻。虽然日军的炮火几乎将阵地夷为平地，郑庭笈主动立下军令状，率部坚守3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也因为这一战的英勇表现，郑庭笈获得了云忠勋章。此后，荣誉第一师编入第五军，郑庭笈调任第三团团长。

1939年9月，桂南战役打响，海上登陆的日军攻占南宁，兵锋直指昆仑关，目的在于切断中国通过法属印度支那的补给通道。郑庭笈所在的第五军，奉命参加此次战役。